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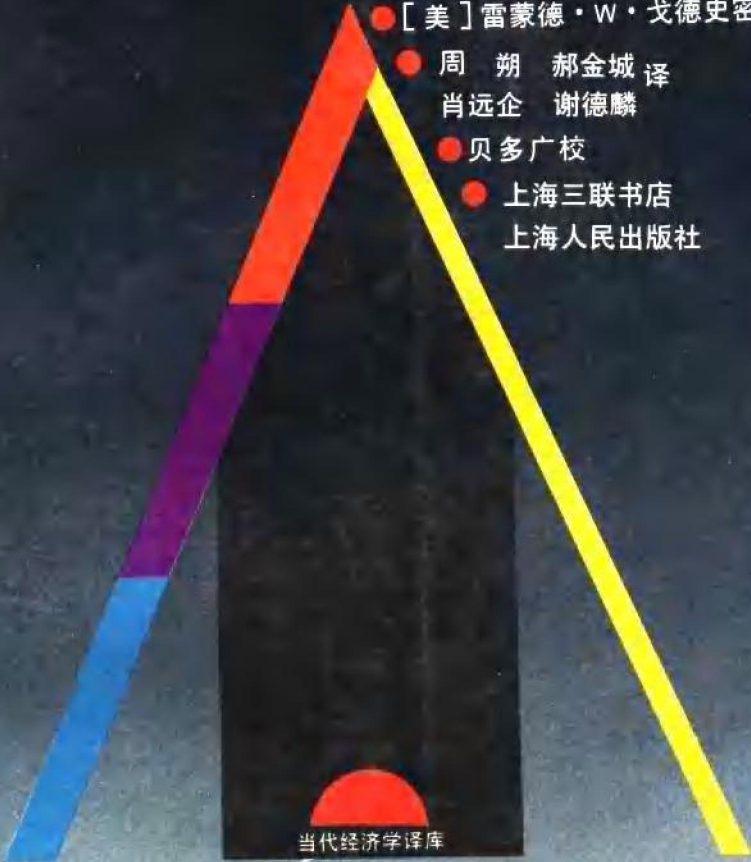
DANGDAI JINGJIXUE XILIE
CONGSHU ●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 [美] 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著

● 周 朔 郝金城 译
肖远企 谢德麟

● 贝多广校

●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当代经济学译库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

(沪)新登字 101 号

Raymond W. Goldsmith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根据耶鲁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 朱国安

翁顺英

封面装帧 宋珍妮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

〔美〕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

周 朔 等译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

上海绍兴路 5 号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5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0 月新 1 版

199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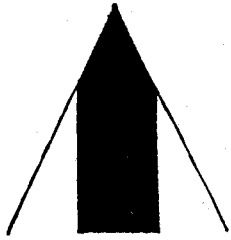
印张: 18.5 插页: 2 字数: 337000

印数: 1—3000

ISBN 7-208-01875-8/F·352

定价: 24.20 元

72112





为了全面地、系统地反映当代经济学的全貌及其进程，总结与挖掘当代经济学已有的和潜在的成果，展示当代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我们决定出版“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

“当代经济学系列丛书”是大型的、高层次的、综合性的经济学术理论丛书。它包括四个子系列：(1)当代经济学文库；(2)当代经济学译库；(3)当代经济学教学参考书系；(4)当代经济学新知文丛。该丛书在学科领域方面，不仅着眼于各传统经济学科的新成果，更注重经济前沿学科、边缘学科和综合学科的新成就；在选题的采择上，广泛联系海内外学者，努力开掘学术功力深厚、思想新颖独到，作品水平拔尖的“高、新、尖”著作。“文库”力求达到中国经济学界当前的最高水平；“译库”翻译当代经济学的名人名著；“教学参考书系”主要出版国外著名高等院校 80 年代后期 90 年代初期的通用教材；“新知文丛”则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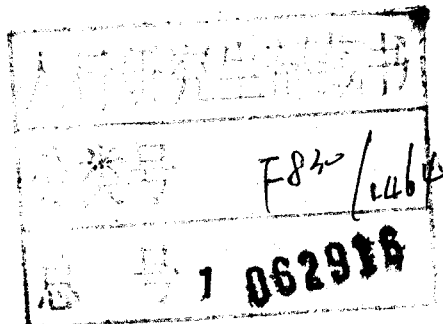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国际上当代经济学的最新发展。

本书致力于推动国际经济学的现代化和国际标准化，力图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从研究范围、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分析技术等方面逐步完成中国经济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轨。我们渴望经济学家们支持我们的追求，向这套丛书提供高质量的标准经济学著作，进而为提高中国经济学的水平，使之立足于世界经济学之林而共同努力。

我们和经济学家一起瞻望着中国经济学的未来。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国经济学家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 (Raymond W. Goldsmith) 1904年出生于比利时的布鲁塞尔，1927年获柏林大学哲学博士，毕业后在德国先后从事统计和金融研究工作。1934年迁居美国，供职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战争生产理事会，并加入国际收入与财富研究协会委员会，兼任该委员会主席。1956年至1961年在纽约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62年至1974年为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退休后，一直兼任该校经济学名誉教授至今。

戈德史密斯是国际上颇有名望的经济学家，他研究的领域很广，并且在这些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财政、金融和经济史方面建树颇多。在美国联邦政府任职的前段时期 (1934—1941年)，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证券市场上，在这之后

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根据形势的需要,他转而研究战时金融和当时德国的币制改革,战争结束后,又把主要精力用在对金融机构、储蓄、资本股票和国民资金平衡表的统计等方面的研究上。如果说60年代以前他研究的地区范围主要局限于美国的话,那么60年代以后,则把整个世界纳入了他的视野。他对经济学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按储蓄的不同形式对储蓄进行了估计;(2)利用永续存货盘存方法提出了美国的储蓄统计学和许多国家的国民资产负债表估计;(3)对金融相关比率、金融中介比率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公式,利用该公式可以表明决定金融相关比率的主要因素。

戈德史密斯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已发表了不少颇有见地的论文,直到现在仍孜孜于著书立说,所以他的著述颇为丰盛,除本书以外,其他影响比较大的书还有:《资本政策》(1933年)、《美国储蓄研究》(1955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美国国民资产负债表研究》(与R·利普西和M·门德尔森合著,1963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美国1953—1980年的国民资金平衡表》(1982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860—1977年印度和1868—1977年日本的金融发展》(1983年,耶鲁大学出版社)。除了著书以外,他在许多国家的不同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论文,

其中1972年发表于《美洲大陆中央银行第10届技术会议学术论文集》上的《拉丁美洲金融发展100年》，在当时引起了较强烈的反响。

戈德史密斯著作的主要特点是资料翔实，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紧密结合，采用比较研究方法。

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多种学派、多种分支学科的大量涌现，其中作为整个经济学一个分支的比较经济学就是在近几十年才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经济学又可分为两个小的分支，即比较经济制度学和比较应用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学以不同的经济制度作为研究对象，例如对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作比较研究，或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不同经济体制作比较研究，比较应用经济学是对不同经济制度下的某些方面作比较研究，例如对不同制度的国家的工业、农业、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制度、劳动力市场、经济增长速度、失业和通货膨胀等进行比较研究。70年代以来兴起的比较金融学作为比较经济学这个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就是以比较经济学为基础而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它主要是对不同经济制度或不同经济体制的国家的金融活动进行纵横比较研究。1969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就是对比较金融学这一领域的最初尝试，作者所倡导并来自实践的比

较金融研究方法和比较金融学的基本内涵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70年代以来对这一学科的研究均是以《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为蓝本的，或是在本书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索，或者直接采用本书的研究方法。总之，这本书可以被认为是一部关于金融学的经典著作，尽管受到时代的限制和作者眼光与兴趣的限制，但本书仍不失为一本具有保存价值、可读性较强的论著。

2

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戈德史密斯认为，“金融理论的职责就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并阐明这些因素怎样通过相互作用，从而形成金融发展”（见第1章）。可以说，这段话导出了本书的基本内容。在该书中，戈德史密斯以9章的篇幅和长达100多页的附录集中围绕着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阐发开去，全书光使用的表格和图形就达150个以上，对世界35个主要国家进行了定性与定量相互交叉、详尽细致的比较研究，并在第1章的最后部分以12个命题对本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进行了简要的概括。

戈德史密斯认为，一国现存的金融工具与

金融机构之和就构成该国的金融结构，这包括各种现存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的相对规模、经营特征和经营方式，金融中介机构中各种分支机构的集中程度等等，并强调指出：“最重要的也许是金融工具的规模以及金融机构的资金与相应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见第1章）。戈德史密斯把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的金融结构分为三种类型，并给出了这种分类所依据的指标。他进而指出，尽管根据这些指标对世界各国的金融结构进行了分类，但这种分类是粗略的、高度概括性的。不仅这三种主要类型的金融结构之间具有很大的差异，就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不同国家的金融结构也不完全是一样的，一国的金融结构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不同的变化，因而，同一个国家不同时期的金融结构也是不相同的。

根据对金融结构理论的分析，戈德史密斯进而对金融发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金融发展就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研究金融发展必须以有关金融结构在短期或长期内变化的信息为基础，他在这些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找出了世界各国金融发展的一条共同道路。尽管金融发展的起点和速度都是千差万别的，但没有资料可以证实除了在战争和通货膨胀时期以外有哪一个国家的金融发展偏离了这条道路。他又指出，这并不是说各国金融发展之间不存在

任何差异，其实，它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据此，他又把这条道路分为两种轨迹。

值得指出的是，戈德史密斯在该书中对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进行了较深入的论述。他认为，由于缺乏资料 and 现代技术处理手段还未达到所要求的水平，因此要确切知道一国一定时期的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究竟具有多大作用是非常困难的，目前对这方面的定量研究尚付阙如。但是他又认为，可以肯定，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因为金融结构改善了经济的运行，为资本转移提供了便利。

作者在第1章概括了该书的基本框架和基本结论。本书的基本内容就是探讨和研究决定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的基本经济因素以及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在此基础上论及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3

《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的出版无疑给西方经济学增添了新的活力，所以，该书在西方经济学界、特别是金融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不仅是因为本书是对比较金融学这一新研究领域的第一次尝试，更重要的也许应该归结于作者在该书中所探索和采用的研究比较金

融问题的基本方法。这种方法是对传统金融学研究的一项突破，并被后来的学者所广泛接受和采用，70年代以来的比较金融研究大都承袭了这种方法。贯穿本书的基本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国际横向比较与历史纵向比较相结合；确立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

戈德史密斯认为，若要研究金融结构，只对金融工具与金融机构进行大致的归类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比较研究的主要兴趣所在是各国之间、各时期之间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上存在的实际差异。根据这一指导思想，他在本书的研究中一共使用了世界上35个最具代表性的国家的有关资料。这些国家不仅有属于发达国家之列的，也有属于欠发达国家之列的，既有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苏东国家，也有(更多的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其他国家，这些国家的地理条件、人口因素、经济制度(或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政治社会制度等方面的情况都是千差万别的。要在这样的基础上对其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进行纵横比较研究，其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尽最大努力力求详细准确地研究其中的差异，并找出具有规律性的方面。作者所使用的资料囊括了上下一个世纪，其覆盖面之广，也是少见的。戈德史

密斯一再强调仅仅进行定性分析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进行定量分析，于是他自始至终都采用了“总量”、“比重”等定量计算手段来描述金融理论中的重要问题，并且推导出不少公式，更形象、更精确地反映各项指标的变动情况。

戈德史密斯创造性地提出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存量和流量指标，其中尤以金融相关比率最为重要。金融相关比率(FIR)是指某一时点上现存金融资产与国民财富之比，亦即与实物资产总额加对外净资产之比。戈德史密斯经过繁杂的推导得出计算FIR的基本公式，并认为基本公式适应于任何时期、任何国家FIR值的计算，通过这个基本公式就可以大致衡量和反映一个国家金融发展的一般面貌。他认为，FIR与其所包含的7个因子呈正向关系，这7个因子是货币化比率、非金融相关比率、资本形成比率、外部融资比率、金融机构、新发行比率、金融资产价格波动和乘数，但FIR与实际收入增长率、物价上涨率以及平均资本—产出比率呈反向关系。因此，一国FIR值高低的原因可以是由多种因素综合形成的，也可以是由某一单个因素独自起作用而形成的。根据几十个国家近100年的资料对FIR的研究，戈德史密斯得出如下结论：(1)FIR有提高的趋势；(2)FIR的提高是有一定限度的，在达到某一阶段后，该比率就会趋于稳定；(3)经

济欠发达国家的FIR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4) FIR与通货膨胀呈反比关系，即通货膨胀率越高，FIR值就越低，反之则反是；(5)不同的FIR值与不同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正相关关系。

总之，戈德史密斯在本书中所采用的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是他以前的学者所不曾尝试过的，他的这一开创性研究奠定了尔后比较金融学的基本特征。

4

本书作为一本世界学术名著，其理论深度和反映现实的力度都是非同一般的，应该说本书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借鉴。例如，在理论研究方面，作者所采用的历史纵向和国与国之间的横向比较研究方法就是目前我国金融理论研究所急需的。戈德史密斯把我国60年代的金融发展水平估计得很低，其发展阶段相当于19世纪前半期的西方国家，姑且不论这种分类是否正确，但它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对我国目前金融发展所处的阶段进行初步估计。戈德史密斯提出的衡量一国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水平的几项数量化指标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在研究我国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时也可以采用或有选择地采用这些指标。作者为比较金融学理论所提出的基本论题对我国尚未起步的比较金融研究应

该会带来一次飞跃性的发展。又如，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在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金融上层结构的增长速度要大大快于国民产值与国民财富这些物质部门的增长速度，因此，FIR 变动的基本趋势是上升的，其间还会发生迅速提高的“暴发运动”，金融的发展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根据上述结论，是否可以考虑适当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让它超前于或至少不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再如，戈德史密斯认为，随着经济发展，银行资产在金融机构全部金融资产中的占有比重将会下降，其他金融机构的资产占有比重相应会大大提高，甚至超过前者。这说明，经济越是发达，非银行金融机构越是重要。另外，戈德史密斯还指出，国外部门的发行比率也影响着一国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并认为外国银行的引进和金融技术的转让对一国的金融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为金融技术的“转让不需要任何资本，而只需部分地引进掌握一定技能的外国工作人员……在这一领域，技术与劳务的转让比在农业、商业和工业领域容易得多”（引自第8章）。因此，是否可以考虑在我国现阶段更大胆地适当引进外资银行或创办中外合资银行，学习外国的先进金融技术，提高金融的对外开放程度。

总之，戈德史密斯认为世界各国的金融发

展都沿着一条共同道路在发展，欠发达国家迟早会走上发达国家已经走过的道路。研究这一共同道路对指导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不无现实意义。本书可供借鉴的地方很多，这里限于篇幅，只能略列以上几个方面，更主要的还有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品味和总结。我们译者的共同心愿就是期望该书能对我国的金融理论与实践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周朔(第1——3章)、郝金城(第4—6章)、肖远企(第7—9章)、谢德麟(附录)。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贝多广先生给予了全面的指导，并对全书进行了极为认真和深入细致的校订，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李弘女士和图书馆工作人员在许多方面给予了我们热情的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我们诚挚的谢意。

周 朔、郝金城、
肖远企、谢德麟

1989年1月于北京